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作者：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该研究通过大样本的调查考察了亲子依恋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机制，并对青少年的同伴因素（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的理论逻辑清晰，模型构建依据充分，研究也具有一定理论和实用价值。但仍然需要在一些概念的完善，数据分析和结果解释方面进行提高。详细请见审稿稿。

意见 1：1.1 中“社会控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导致沉迷网络？在这里应该做些简单地交代，在讨论中也需要抓住这个议题。在依恋理论中，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是两个基本维度（Brennan et al., 1998），温暖支持和社会控制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社会控制是指社会成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的一种调节功能，即使他人主观上不愿意做出相应的改变（Lewis & Rook, 1999）。在本研究中，良好的亲子依恋提供了社会控制的功能，此时个体担心沉迷网络及相伴出现的问题（如学业失败）会让父母伤心（Hoffmann, 2011），因而减小了 PIU 的可能性。这里仅对其做出简单交代。1.3 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 第三段 对社会控制作了更多介绍：根据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家庭相关变量具有社会控制的作用（Hirschi, 1969）。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直接社会控制和间接社会控制两种具体形式（Oxford, Harachi, Catalano, & Abbott, 2001）。当个体较为年幼时，父母作为一种权威对孩子更多施加直接控制（如父母监控），随着个体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自主性的增加，直接控制减少，间接控制增加（Oxford et al., 2001），且后者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所考察的亲子依恋就是典型的间接控制变量，此时把意志控制这一自我控制变量纳入进来，有助于考察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如何交互作用影响青少年 PIU。

在讨论部分，也对社会控制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非常关键。早期主要关注青少年犯罪的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问题。Reiss（1951）指出家庭依恋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遏制理论（containment theory）中进一步概括出内遏制和外遏制：内遏制即是指自我控制，外遏制则指来自个体外权威（比如父母、老师等）的监控和管理（Reckless, 1967）。Hirschi（1969）提出的社会联结理论（social bond theory）认为心理和社会成分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的社会成分即是指包括依恋、服从权威在内的社会控制成分。关于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Hirschi（1969）认为这两者都很关键，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其中的某一个可能更为重要（Gibbons, 1994）。本研究认为这两者谁更重要并不是关键问题，重点在于这两种控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交互作用则可以对该问题作出回答。就本研究而言，亲子依恋的保护作用对于低意志控制的个体更为显著，说明社会控制对于自我控制较低的个体效果可能更明显。

Brennan, Clark 和 Shaver（1998）结合成人依恋（恋人之间的依恋）的研究指出，依恋具有回避和焦虑两个基本维度。这是针对依恋结构本身的维度而言的。本研究使用在青少年期较常用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PPA）来测量依恋安全性。该工具包含信任、沟通、疏

离三个维度。这些维度也是针对依恋本身的结构而言的。以往研究指出，亲子依恋作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可能具有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两大核心功能，可以促进个体健康发展（Luthar, 2006）。本研究旨在从亲子依恋所具有的两大功能来阐述其影响 PIU 的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亲子之间具有良好的依恋，则这种依恋关系可以发挥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的功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 PIU。先前的表述不够准确，容易使读者将亲子依恋所具有的两大功能同亲子依恋本身的测量维度产生混淆。本次修改时对这两大功能进行了重新表述：“在理论层面上，良好亲子依恋所具备的两大核心功能（情感温暖、社会控制）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 PIU”。

意见 2：1.2 中“同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更加直接（Bogenschneider et al., 1998），是导致青少年物质使用和犯罪的近端因素”，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同伴是导致青少年物质使用和犯罪的近端因素”？同伴也有积极的作用啊。

回应：诚如专家所言，同伴对青少年发展不仅仅是消极作用，也存在积极影响。本次修改时结合上下文语境，强调了不良同伴具有消极作用，而不是泛泛地提及同伴具有消极作用（详见 1.2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第二段）。

意见 3：1.3 第二段首句中“意志控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需要在这里加以简要说明。这一段和下一段应该调换，以免读者理解困难。

回应：本次修改已简要说明了意志控制的含义：意志控制（effortful control）是指个体抑制优势反应、激活次优势反应的自我调节能力（Rothbart & Bates, 2006）。另外，这两段的逻辑顺序确实有些混乱，容易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本次修改已经交换了两段的先后顺序。

意见 4：IPPA 量表有三个维度，但论文中只有一个得分，这样是否符合原量表的要求，是否合适？在前面提到亲子依恋的两个核心成分：温暖支持和社会控制，在这里是否能有所反映？

回应：关于 IPPA 量表的得分，在以往文献中要么是算总分，要么求各个维度的得分，究竟采用何种计分，更多取决于研究目的。如果要深入考察各个维度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就必须求各个维度的得分。考察亲子依恋三个维度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关注亲子依恋总体质量的好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根据 IPPA 原量表的使用手册，由于 IPPA 三个维度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可以直接计算总分（Armsden & Greenberg, 1987）。例如，“The dimension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in each relationship type and are therefore commonly aggregated to yield a single index of security insecurity with respect to parents or peers”。因此，本文直接计算了该量表总分。

另外，如前所述，Luthar（2006）指出亲子依恋作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具备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两大功能，因而可以促进个体的健康发展。本研究在此观点的指导下旨在从亲子依恋所具有的这两大功能来阐述其对 PIU 的作用机制。因此，亲子依恋所具有的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的功能并未直接反映在亲子依恋本身的测量维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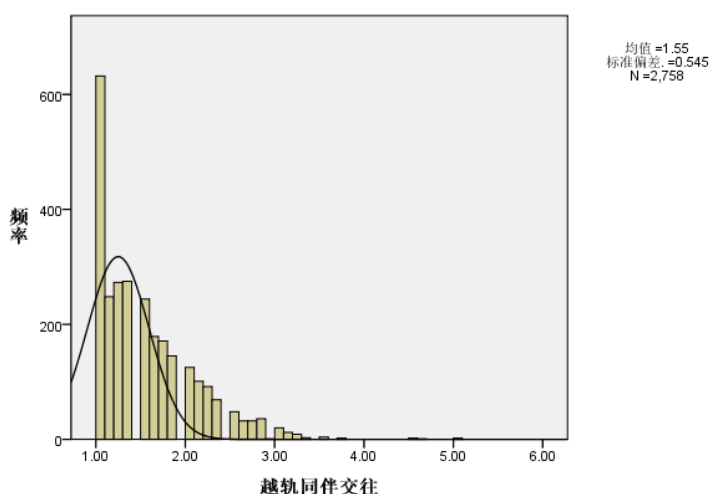
意见 5：意志控制量表也有三个维度，简单地合成一个指标是否合适？有无依据？

回应：意志控制量表包含了在概念上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根据量表编制者 Rothbart 及其合作者的理论建构和计分方式（Ellis & Rothbart, 2001; Rothbart & Bates, 2006），可以计算这些维度的合成分数，因为这几个方面是意志控制的具体指标。这样的计分方式也在其它研究中

有所使用 (e.g., De Pauw & Mervielde, 2011; Li, Zhang, Li, Zhen, & Wang, 2010; Véronneau, Hiatt Racer, Fosco, & Dishion, 2014; Whittle et al., 2008; Xu, Farver, & Zhang, 2009)。在本研究中, 三个维度呈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r_s = 0.30 \sim 0.52, p_s < 0.001$), 说明其所测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

意见 6: 越轨同伴交往的平均分为 1.55, 这个数据应该显示被试交往的越轨同伴人数是比较少的。是否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有关这个量表的人数分布信息 (仅供参考)? 以便在讨论时有更确切的依据。

回应: 本研究中越轨同伴交往的人数分布图如下:



诚如专家所言, 被试交往的越轨同伴人数不是非常多。刘成斌 (2006) 在其方法学论文中指出, 研究总体可以分为“绝对总体”和“相对总体”, 相对总体是指如果分析单位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群概念, 而是相对于另一个人群所指涉的概念, 那么调查对象就应该同时包括本研究单位和相对应的单位。根据该观点, 本研究为了探讨越轨同伴交往的效应, 就应该在结交较多越轨同伴和结交较少越轨同伴 (包括没有结交越轨同伴) 的个体之间进行比较, 即本研究选取的越轨同伴交往这一变量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此时若只以有越轨同伴交往的青少年为对象, 这将导致自变量全距受限 (range restriction), 缩减变量得分的变异性, 从而有偏地估计 (高估 vs. 低估) 变量间的关系 (Kaplan & Saccuzzo, 2013)。因此, 我们认为, 即使越轨同伴交往的得分低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确保样本中有足量的越轨同伴交往者呢? 文献中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 一是增大总样本容量 (obtaining large samples), 意指按照事件发生的固有比例进行大样本抽样, 从而保证低频事件也有足量的被试, 这样所抽取的样本不会扭曲事件发生的常态, 但缺点是费时费力。二是超量抽样 (oversampling), 意指在低频事件发生概率相对较高的区域进行抽样, 这样可增加低频事件的数量, 缺点是这种非比例性抽样 (nonproportional sampling) 会扭曲变量间的相关 (Kareev & Fiedler, 2006)。三是极端组方法 (extreme groups approach), 即选取变量得分较高和较低的两组群体构成高低极端组, 丢弃分布于中间状态的取值。许多研究者采用这种方法, 但该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 人为丢弃中间取值扭曲了数据分布的常态 (生态效度差), 导致信度膨胀和效应值偏差, 且研究结论与所提问题有太大差距 (Preacher, Rucker, MacCallum, & Nicewander, 2005)。因而方法学家不建议使用该策略。

经权衡和考量, 本研究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增大总样本容量, 由此来保证越轨同伴

交往的被试量。统计分析表明，在本研究中，有 22.9% ($n = 631$) 的被试没有结交越轨同伴，剩下 77.1% ($n = 2127$) 的被试都或多或少结交了越轨同伴。

意见 7: 3.2 第三段“亲子依恋正向预测 PIU，意志控制正向预测 PIU”，“正向”应该都为“负向”？

回应: 非常抱歉，此处属于笔误，已在文中改正。

意见 8: 4.1 第二段“如果这时父母不能进行合理的引导，亲子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孩子便可能通过结交不良同伴来反抗父母或引起父母的注意”，这里还是从亲子依恋的基本功能进行分析，尤其是安全基地的作用 (Hazan & Shaver, 1987)。

回应: 感谢专家提出如此细致的建议，已在文中增加相应论述。详见 4.1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第二段。

意见 9: 4.2 第二段“换句话说，对于意志控制水平较低的个体，不良的亲子依恋更容易导致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意志控制与亲子依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安全型依恋程度越高，个体的意志控制越强。因此，这里可以从依恋的内部活动模型进行适当地分析 (Mikulincer & Shaver, 2007)。意志控制水平较低的个体，其对依恋对象的预期也是负面的，因而会与一些越轨同伴进行更多的交往。

回应: 根据专家建议，已从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适当分析。见 4.2 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 第二段。

审稿人 2 意见: 该文写作规范、流畅，样本较大，数据可靠。建议修后发表：

意见 1: 大幅压缩问题提出部分，让文献评述更聚焦些。目前文献太多了。

回应: 同意专家意见，已对问题提出部分进行压缩，删除了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文献，修改后该部分篇幅控制在两页半左右。由于删除的内容较多，在此不一一列出。

意见 2: 建议补充报告每条路径或者每个自变量及其乘积项的贡献率或决定系数，这有助于读者判断模型的价值或者变量关系的强度。

回应: 已接受专家建议，在文中补充了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详见 3.3 亲子依恋与 PIU 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 第三段)。

意见 3: 意志控制对亲子依恋与越轨同伴交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虽然显著，但是这种作用似乎很微弱，建议弱化这方面的结论。

回应: 在非实验类研究中，调节效应的效果量通常都不高 (Aguinis, Beaty, Boik, & Pierce, 2005; Kenny, 2013; 叶宝娟, 温忠麟, 2013)。例如，一项对 30 年来社会和科学中乘积项效果量的元分析表明，乘积项效应的中位数转化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 0.045 (Aguinis et al., 2005)。本研究调节项的效应仍然高于这一中位数，所以我们仍然承认了该调节效应。但诚如专家所言，在下结论时仍应保持必要的谨慎。本次修改时在文中指出了这一点，详见 4.2 意志控制的调节效应 第二段。

意见 4: 去掉文章的页下注, 减少不必要的对方法的泛泛介绍。

回应: 已接受专家建议, 删除了有关被试选取的细节问题以及为何没有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处理数据的理由。

意见 5: 文章的结果部分有些单薄, 是否可以挖掘更多结果。

回应: 本次修改时, 我们对数据结果进行了三方面的挖掘: ①报告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总体检出率, 与雷雳 (2010) 的综述结果进行了对比; 呈现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的青少年在 PIU 上的亚群体差异 (详见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②报告了本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在不同性别和年龄亚群体中存在差异。结果表明, 该模型在当前样本条件下没有表现出太多亚群体差异 (详见 3.4 补充分析)。③采用固定效应的方法 (fixed effects approach) 处理了学生嵌套于学校所带来的观测不独立性问题 (Cohen, Cohen, West, & Aiken, 2003), 使研究结果更准确 (详见 2.4 分析思路 的说明)。

审稿人 3 意见: 文章从发展心理学中的社会发展模型和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入手探讨了 PIU 有关的预测问题, 选题较为新颖, 文献较为充实, 语句流畅。建议作者考虑如下问题:

意见 1: 依恋理论是否更有助于建立本文模型? 文内理论尚未从变量间的内在关系讨论假设, 依恋理论可能更有助于解释亲子依恋、同伴越轨与 PIU 的关系。

回应: 同意专家意见。已在本文引言 (详见 1.2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第三段) 和讨论 (详见 4.1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第二段) 部分的适当地方增加了依恋理论的相关论述。

意见 2: 文章需要补充共同方法偏差的内容, 本稿未见检验结果。

回应: 已接受专家建议, 在结果部分补充了共同方法偏差的过程控制和统计检验 (详见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意见 3: 同伴偏差行为包括吸烟、酗酒、考试作弊、PIU 等, 其理论与实证依据是什么? 有研究使用同伴提名方法测量偏差行为, 为何本文未考虑这种方法, 请解释。

回应: 本研究的越轨同伴交往涉及了好朋友在八个方面的偏差行为, 其理论和实证依据在于: ①这些行为均与偏差行为的定义 (即偏离或违反社会相关法律和行为规范并可能起负面作用的行为) 相符, 并且在以往的越轨同伴交往与青少年发展 (不专门针对 PIU) 的研究中通常也涉及这些方面。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本研究结合中国青少年的生活实际, 将沉迷网络也纳入进来, 从而更好地反映当前我国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特殊内涵。②这些行为都可能使个体受到同伴的越轨训练 (peer deviance training), 使个体认为偏差行为是正常且可以接受的, 从而增加青少年 PIU 的可能性 (Prinstein & Dodge, 2008)。例如, Yang 等人 (2008) 发现, 与沉迷网游的朋友交往容易使青少年沉迷网游。Yen 及其同事 (2009) 发现, 朋友的烟酒使用和其它偏差行为 (该工具不涉及 PIU) 是青少年 PIU 的风险因素。③对 8 个项目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KMO 系数为 0.86,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 $\chi^2 = 7729.52, df = 28, p < 0.001$, 说明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法进行分析, 仅有一个因素特征值大于 1, 且碎石图在此后发生明显转折, 表明只能提取一个因素, 方差贡献率为 48.55%, 各项目的载荷在 0.57 ~ 0.81 之间, 说明这些题目较好地体现了越轨同伴交往的共同内涵。

在现有发展心理学文献中，越轨同伴交往的测量主要是由青少年本人、父母、教师等主体进行评价的，同伴提名确有使用但并不是非常普遍。本研究没有采用同伴提名，主要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研究的可行性而言，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要比同伴提名更容易收集到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二是从社会称许性的角度而言，同伴提名需要对被试记名，特别是在同伴偏差行为这种消极行为上记名，容易导致社会称许性。相比之下，采用匿名条件下的自我报告更容易打消被试填写问卷时的疑虑，让他们放心作答。这可能也是不少研究（Burt, McGue, & Iacono, 2009; Hampson, Andrews, & Barckley, 2008; Tarantino et al., 2014; Scott, Weaver, & Prelow, 2005）采用自我报告测量越轨同伴交往的原因。本次修改在 2.2.2 越轨同伴交往 中解释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在 4.3 研究不足和展望 中提出未来研究应综合使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

意见 4：“每所学校均获得 3000 元左右的报酬。”，问卷填写者是否知道这件事？如知道是否对问卷结果产生影响。

回应：这些报酬交给了学校领导，问卷填写者对此并不知情。见 2.3 研究程序。

意见 5：“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效应更强， $B_{\text{simple}} = 0.09$, $SE = 0.03$, $p < 0.001$ ；”这里的回归系数并非负向，请检查是否笔误。

回应：此处确实属于笔误，在此表示抱歉。本次修改已进行了相应的订正。

意见 6：本文属于大样本研究，是否存在年级与班级效应？

回应：诚如专家所言，本文属于大样本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亚群体间的差异。本次修改已补充了不同亚群体的 PIU 状况，包括性别和年龄（年级）方面的差异（详见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遗憾的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了尊重学校领导和班主任的意见，我们在问卷设计中没有采集班级信息，所以这里也就未能对班级效应进行相应的检验。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文章修改让人满意，建议进一步增大依恋理论与本研究模型的拟合程度。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认可。我们在文章引言和讨论部分修改或增加了依恋理论的相关论述，使依恋理论与本研究模型更加契合。具体包含以下四处修改（见文稿标蓝的部分）：

“另外，根据依恋理论，安全依恋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对他人怀有善意的信任，这些可以让其有更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更具有长远眼光而不是即时享乐和获得奖赏，更能够得到健康发展（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Gailliot, Mead, & Baumeister, 2008）。相反，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则容易出现不良适应问题，青少年可能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依恋对象或者通过网络寻找新的依恋对象从而沉迷于网络（Lei & Wu, 2007）。”

“依恋对象作为避风港和安全基地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Bowlby, 1982）。通过与父母形成良好的安全联结，个体获得较为健康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对依恋对象和自己形成更积极的表征。同时, 个体在亲子关系中开始形成与他人互动和建立关系的期望和假设, 孩子与父母的依恋质量将影响之后的人际关系 (Bowlby, 1973; Damon & Lerner, 2006)。亲子依恋对孩子家庭外的社会关系 (如同伴交往) 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 相对于安全依恋的孩子, 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情绪管理和冲动控制能力发展较差 (Grossmann, Grossmann, Kindler, & Zimmermann, 2008), 意志控制的典型作用是情绪调节能力 (Eisenberg et al., 2007), 这种能力及带来的良好情绪正是不安全依恋个体所缺乏的。因此, 考察意志控制与亲子依恋的交互作用具有独特意义。”

“另一方面, 依恋理论强调依恋对象“安全基地”对个体的保护作用以及“内部工作模型”对个体的积极建构意义, 随着个体的发展, 个体需要不断对依恋安全进行“拓展和建构” (Mikulincer & Shaver, 2007a, 2007b), 除了亲子依恋之外, 同伴环境和网络环境 (作为外部环境) 以及个体特征 (如意志控制) 成为了影响青少年自我探索和成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这种整合既带来了概念上的丰富性, 又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对于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依恋与人际关系以及网络使用的关系有一定启发。”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经过修改后, 已经比较符合发表要求。论文逻辑比修改前有了较大的改善, 建议对文字再精炼些, 对细节进行适当修改后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修改的肯定。根据专家意见, 我们对文章文字表达和细节进行了适当修改。

第三轮

责编意见: My decision is to accept the paper for public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for the authors: The large sample size makes most of your resul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ut you should note that some of the effects are quite small. Fortunately, most of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had meaningful and non-trivial coefficients or effects. But there is one exception which 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b = -.04$). Saying this is significant is misleading. Pls change or modify you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is basically non-existent. You should explain accordingly. That is you should explain why there is little or no effect (even though it is significant). You should also note that two of your control variables – age and SES, had no effect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even though they were significant. You should say that your sample is homogeneous in SES and age so that these two variables do not have strong correlations with the outcome variables, but to be conservative, you still tried to control these variables.

回应: 诚如编委专家所言, 本文是一个大样本研究, 对于变量之间关系效应大小的描述和解释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而不能仅仅根据数据统计上的显著与否进行描述和解释), 感谢专家对此的提醒和建议。

(1) 本文对意志控制在亲子依恋与越轨同伴交往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效应检验时

发现,当意志控制水平较高时,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B_{\text{simple}} = -0.04$, $SE = 0.02$, $p < 0.05$; 当意志控制水平较低时, 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效应更强, $B_{\text{simple}} = -0.13$, $SE = 0.02$, $p < 0.001$ 。如专家指出, $B_{\text{simple}} = -0.04$, $SE = 0.02$, $p < 0.05$, 虽然统计上显著,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弱。我们同意专家意见,对这段简单效应检验的结果表述做了适当修改: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该交互效应的实质,我们计算出意志控制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时, 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效应值(即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亲子依恋和意志控制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检验发现,当意志控制水平较低时, 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_{\text{simple}} = -0.13$, $SE = 0.02$, $p < 0.001$); 当意志控制水平较高时, 亲子依恋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B_{\text{simple}} = -0.04$, $SE = 0.02$, $p < 0.05$; $B_{\text{simple}} = -0.13$ 减弱为 $B_{\text{simple}} = -0.04$)。值得说明的是,此处我们更关注亲子依恋和意志控制交互作用的大小,简单斜率检验也旨在揭示该交互作用的具体模式。因此,对于单独的 $B_{\text{simple}} = -0.04$ 的作用效应不再进一步解释,且该结果也并不影响本文的结果和讨论。

(2) 关于控制变量(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由于本文被试全部为7至9年级学生,样本在年龄上确有一定的同质性,这可能是年龄对因变量预测效应不强的原因之一。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如本文被试部分交代,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应群体受教育水平的全国平均状况比较接近。因此,我们认为SES在本研究被试中并不同质。以往关于SES与PIU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存在一定争议。所以,对于控制变量,我们基本同意专家的意见,对于为什么控制这两个变量做了进一步说明:虽然文中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对PIU的作用并不强,但考虑到样本年龄的同质性以及以往SES与PIU关系的争议性,为了保守起见,本文对这两个变量依然进行了控制。